

# 拟史:宋元讲史平话的叙事策略

楼含松

(浙江大学 中文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因为题材的客观要求和创作者的有意仿效,讲史平话的叙事特征不同于一般的小说话本,带有明显的“拟史”倾向。讲史平话在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的处理上,存在对传统史书的借鉴。通过与小说话本和史书的双重比较,可以看出讲史平话的叙事手法在遵循说话艺术线索清晰、细节丰富的同时,也较多运用了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结构形式。

**[关键词]** 讲史平话;叙事速度;叙事顺序;时空结构

**[中图分类号]** I207.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6)05-0083-07

宋代说话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民间口头叙事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宋代说话是高度职业化的说唱表演,题材丰富,表演技艺也日臻成熟,并形成了不同的门派。尽管迄今学术界对所谓的宋代说话“四家数”究竟是哪“四家”莫衷一是,但对“小说”和“讲史”是当时最重要的两个门类,则没有什么疑问。小说和讲史的主要区别在于题材和篇幅。小说以现实题材为主,篇幅较短,通常是一次讲完;讲史是“讲说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时间跨度大,内容复杂,需要分回讲述。另外,两者的叙事方法也有所不同。本文着重从民间讲史与历史著述的关系角度探讨讲史平话的叙事特征。现存的宋元讲史平话并不等同于讲史本身,它是口头文学转换为书面文学的产物,在转换过程中,平话的加工整理者根据自己的文化修养,对口头文学材料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造,也从传统史著中借鉴了不少内容和叙事技巧,即讲史平话通过“拟史”——对史著的仿效,确立了符合自身题材要求的叙事特征。

## 一、叙事速度

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说:“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长久。”这段话专指说话叙事艺术的技法和套路,尤其注重叙事速度和节奏的变化。“讲论处”指说话人在讲述过程中穿插的议论、评说,这些话头是情节之外的叙述干预,要求简明扼要,不影响情节的连贯,因此,小说话本中纵然常常穿插议论,但不会喋喋不休,往往点到为止,有时还会在议论之后加一句“闲话休提”。“冷淡处”指在故事发展过程中缺乏生动情节的部分。因为说话注意维持叙述的线性,所以这类“冷淡处”也得有必要的“交代”,需通过常用的套路加以“提掇”(提示、连接)。话本中多有“不则一日”和“时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等套话来作提示,用来填充因情节“冷淡”而造成的时间空白。这个时候,叙述是快速推进的,即所谓“有话则

**[收稿日期]** 2006-08-0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3BZW019)

**[作者简介]** 楼含松(1963-),男,浙江浦江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长,无话则短”。到了“热闹处”,也就是情节发展的关键部位、高潮阶段,则放慢叙事速度,运用敷衍、穿插等手段,精描细刻,尽量盘旋,有意延宕叙事时间,说书人在这方面有惊人的本领<sup>①</sup>。除细致的描写外,“敷衍得越长久”的技巧也包括穿插诗词赞语、议论、书信文牒等。这段话阐述了说话人对叙事速度的掌握与控制的技巧。

讲史平话中同样也有叙事速度的变化,但和小说话本又有所区别。小说“随意据事演说”,敷衍穿插的自由度比较大;而讲史“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出于对内容真实性的要求,可以自由发挥的余地比较小。鲁迅最早注意到讲史在叙事速度上的变化规律。他在论《五代史平话》时说:“全书叙述,繁简颇不同。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俪,证以诗歌,又杂诨词,以博笑噱。”<sup>②</sup>也就是说,凡是史书上记载的事,平话以史书为本,叙事速度较快;而于史无载的情节,主要来源于民间传说和说唱艺术,叙事速度就放慢。在《五代史平话》中,前者主要指兴废争战的大事,后者主要指帝王、大将们微时行径。鲁迅虽然是就《五代史平话》而论,但这一叙事速度变化的规律在讲史平话中带有普遍性。

叙事速度的快慢,主要与情节和细节的丰富与否有关。在古代史著中,当然也不乏细致的描写,尤其是文学性强的史著,如《史记》作者更以此为能事。不过,史家的法则是简要。刘知幾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并进一步指出:“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sup>[1]</sup>既要文字简约,又要内容丰富,就必然要加快叙事速度。简要也是一种美,它往往和含蓄联系在一起——刘知幾在论简要的同时就提出“用晦”的主张,这是古代史学的重要叙事原则,其理论依据是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含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美学理想的重要特征,对简约含蓄的追求,是文人趣味的体现。但说话艺术出于演出的实际要求,必须做到明白易懂、生动感人。说书人一定要态度鲜明,感情饱满,绘声绘色,议论风生,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听众的感情共鸣,以此增强讲说的吸引力。如《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说:“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嚏发迹话,使寒士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要获得这样的艺术效果,除了说书人充分运用表情、动作、声调外,主要还得依靠情节和细节,以及说书人直接介入的议论,这就要说书人发挥想像,形容铺叙,而不是“简要用晦”。这是不同于主流文化的通俗文学的特征。但讲史由于以史书为依托,纯属虚构的想像就不成其为讲史了,所以总体上看叙事速度都是较快的,只有在于史无稽或史书中语焉不详的地方,想像力才得到自由发挥。南宋初郑樵《通志·乐略》就指出了这一特点:“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间,而其事亦有记载。虞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不过数十言耳,彼则演为千万言。东方朔三山之求,诸葛亮九曲之势,于史籍无其事,彼则肆为出入。”如《尚书》载武王誓文中数纣之罪称“焚炙忠良,剝剔孕妇”,到了《武王伐纣平话》中则演化为具体生动的情节。根据《史记·殷本纪》中“为三公九侯有好女人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王怒,杀之而醢九侯”的简单记载,平话中塑造了黄飞虎妻这一坚贞的女性形象。《武王伐纣平话》和《乐毅图齐》离史实较远,并杂以神怪,穿插敷衍较多,叙事速度就比较缓慢,也比较生动。《五代史平话》和《宣和遗事》的后集中依据史书的部分,行文峻洁,但生动不足。其他几种,其叙事速度也大抵视离史实远近而定。

叙事的速度变化是作者对现实世界中自然时间的选择性加工,在这一点上文学创作显然比历

<sup>①</sup> “昔人谓善评话者于《水浒》之武松打店,一脚阁短垣,至月余始放下,语虽近谑,然弹词家能如是,亦岂易耶?”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87页引《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0年版。

<sup>②</sup> 详见《中国小说史略》第12篇“宋之话本”,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



史著述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像变焦镜头一样根据自己的意愿将时间放大或缩小。速度变化也形成叙事的节奏感,这是叙事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过多倚重史书的讲史平话,其实是放弃了对时间的控制权,也放弃了文学创造力的发挥,结果是平铺直叙,缺乏生气,像《五代史平话》和《宣和遗事》就几乎被开除出文学作品的行列,被当作通俗的历史读物。《五代史平话》的改编者对民间讲史故事作了很大改动,将叙述重点从李存孝、王彦章等人的英雄传奇转向了五代兴亡的历史追述上;《宣和遗事》后半部分是野史资料的汇编,与民间讲史基本没什么关系。现存平话中,从史学角度看,这两种作品最接近史体,而从文学性要求看,则是水平较低的。

## 二、叙事顺序

故事“发生—发展—结束”的顺序,和“过去—现在—将来”的自然时序是一致的,按照这一顺序叙事称为顺叙,打破自然时序的叙事则称为倒叙或插叙。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就有不少是运用倒叙的叙述方式,如唐传奇中的《古镜记》是由王度失去古镜开头,再倒叙古镜的来历和灵异的;李复言《续言怪录》中的《薛伟》,先写薛病愈,再由薛倒叙梦中化鱼事。但在白话小说中,通常不用倒叙手法。个中原因,主要是在登场表演时,按照自然时序的连贯叙述,脉络清晰,易于听众的记忆和理解<sup>①</sup>。也就是说,白话小说特别注重叙述的线性,而维持叙述线性的最便捷和有效的方法就是顺叙。

维持叙述线性的另一途径是遵循情节的因果顺序。但在通俗小说中,因果顺序总是从属于时间顺序。从逻辑上说,时间上在后的事件不一定是时间上在前事件的结果。但小说叙事是带有作者主观性的叙述活动,经过作者选择的前后事件必然有因果关联。同样,发生在同一时间段上的不同事件,经过作者选择性的先后叙述,也就带上了因果关系。因此,即使通俗小说中常有讲叙同时发生的两件或更多事件的情况,但从不给人以头绪纷繁的感觉,加上用“花开两朵,单表一枝”、“再说”、“却说”来表示叙述起点的话头,以使叙述主线清晰可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基本上是单线结构,但事实上白话小说中多条情节线索交叉叙述的情形并不罕见,如《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宋江准备三打祝家庄时,吴用献上一计,宋江大喜。接着用将近一回的篇幅叙解珍解宝的故事。这一段故事很长,插进来容易造成叙述主线的中断,为此作者不得不花费笔墨来提醒读者:“看官牢记这段话头,原来和宋公明初打祝家庄时,一同事发,却难这边说一句,那边说一句,因此权记下这二打祝家庄的话头,却先说那一回来投入伙的人乘机说的话,下来接着关目”。在说明这另起一头的叙述是事出无奈的同时,又强调了时间连接的方式,并提醒这段叙述和叙述主线有因果联系。受传奇戏曲的影响,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有不少以才子和佳人各自的行动组成两条齐头并进的情节线索的叙事结构,但叙述的线性仍然保持得很好。因此,不把单线结构理解成单一线索的结构,而理解为叙事顺序的线性结构,则大致是不错的。线性叙述对情节的连贯、紧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叙事结构,因此无论中外,早期小说大都采用单线结构。

情节是性格形成的历史,以人物成长的历史来贯穿故事情节是维持叙事线性结构的有效而自然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史著中,司马迁的《史记》首创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连贯叙事。这一叙事结构的创立不仅对后世历史编纂学影响深远,而且也成为古代小说普遍遵循的结构方式。唐人传奇之所以成为小说发展史的里程碑,标志了古代文言小说走向成熟,在叙事技巧上的一大进步就是借鉴了纪传体的结构特点,即原始要终,首尾完备,与以往“残丛小语”、“粗陈梗概”的小说判然

<sup>①</sup> 陈平原将“三言”中几篇根据文言小说改编的拟话本与原作进行比较说明了这一问题。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294页。



有别。唐人传奇的篇名也多称“传”，如《柳毅传》、《补江总白猿传》等。在白话小说中，同样也可看到纪传体的影响：小说话本的中心内容虽然是围绕事件展开的，但对故事中人物的出身、结局都有原原本本的介绍。但小说话本的篇名很少称“传”，而往往以对中心事件的概括给作品命名。

讲史平话的内容，时间跨度长，情节丰富，人物众多，其叙事结构比小说话本要复杂得多。但为了使得叙事头绪清晰，便于听众掌握，讲史家不得不采取删繁就简的手法，将内容尽量集中到一两个中心人物身上。以《全相平话五种》为例，有四种在正题之下有副题，《武王伐纣平话》的副题是“吕望兴周”，《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的副题是“乐毅图齐”，《秦并六国平话》的副题是“秦始皇传”，《前汉书平话续集》的副题是“吕后斩韩信”。副题就大致告诉了读者该平话的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尤其是“秦始皇传”，更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平话和史著的关系：这部作品主要是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演绎的。《武王伐纣平话》其实就是“商纣传”，平话从纣王初登帝位叙起，到殷郊斩纣王结束，前半部分写纣王种种倒行逆施，后半部分写武王伐纣、吕望兴周。《三国志平话》虽然没有副题，但可以看作是刘备和诸葛亮的合传。这部作品的正话由桃园结义开始，详细介绍了刘备的出身，然后写他讨黄巾、任平原县丞、讨吕布、投徐州、奔袁绍……到跃马过檀溪，差不多是全书一半的篇幅；接下来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场，隆中对策、赤壁之战、三气周瑜、收川、七纵七擒、六出祁山等，到秋风五丈原，都是以诸葛亮为主角。诸葛亮一死，平话就以草草数百字结束了全书。

刘知幾《史通·列传》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核之《史记》，这一概括大致是正确的。本纪大都有明确的纪年，以编年顺序记事，犹如大事年表，即使无事可记，也要标明年份，如《秦始皇本纪》：“三十年，无事”。本纪虽然也以人物为中心，但重点不是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而是史实的编年和人物的履历。本纪中有几篇没有编年，如《殷本纪》，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从编年。《项羽本纪》也没有编年，因此刘知幾谓之“纪名传体，所以成嗤”，在他看来这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是不应该列入本纪的。这并不是刘知幾首创其说，班固早就在《汉书》中将项羽列入列传了。但司马迁这样做是有根据的，因为项羽一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项羽本纪》确实具备了列传的叙事特点：它着重选择最能显示项羽性格特征的几个事件来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用钜鹿之战、鸿门宴、楚汉对峙、垓下之围这四大事件勾勒了项羽的一生，并作了十分生动和细致的描写。《项羽本纪》代表了《史记》人物传记的杰出成就，人物性格刻画与命运起伏紧密相关，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全相平话五种》中，《武王伐纣平话》写纣王，就通过纳妲己、酒池蚕盆、炮烙铜柱、剝剔孕妇、杀黄飞虎之妻、剖比干之心等一系列情节刻画出他昏聩残暴的性格特征的。《秦并六国平话》以《秦始皇本纪》为本，编年最详细，作者虽对史实作了剪裁，情节比较集中，但没有消除本纪编年的影响。如卷上：“始皇八年，韩威（应作桓）惠王卒，立子安为韩王。九年，韩王为元年。九年，楚考烈王卒，子悍立为楚幽王。十一年，赵卓（应作悼）襄王卒，子迁立为赵王。天下诸国平宁。十四年，韩王纳土为藩臣。”毫无情节可言，只是为了保持编年的连贯性。《前汉书平话续集》提到的纪元较多，《三国志平话》中纪元就很少，而且“触处皆谬”。如大战虎牢关系于中平五年，实在初平三年；献帝授衣带诏系于中平九年，实在建安四年；三顾孔明系于中平十三年，实在建安十二年。更有甚者，在叙朝代更替这样重大的事件时，也多有错误。如三国之立，平话中记叙甚简：“曹丕受禅台，众官贺新君，改年号黄初元年……却说江吴孙权立为吴大帝，改黄龙元年。西川军师听得，告汉中王得知……军师不由玄德，立为蜀川皇帝，改建武元年。”其实三国之立的先后顺序，应是魏、蜀、吴；吴开国年号应是黄武元年，蜀开国年号应是章武元年。这些错误固然表明作者的历史知识有限，但也说明作者把自己创作的重点放在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和讲叙生动的故事上，而不拘泥于具



体的年月,这一点正得《史记》人物传记之精髓<sup>①</sup>。

以纪传体的叙事方式来结构作品,能使线索清晰,情节集中。但以一个中心人物来贯穿情节也有其局限性,即难以展现广阔复杂的社会场景和纷纭的历史事件。在史书中,可以用众多的列传来弥补这一缺陷,但小说显然无法这样做。这一缺陷在《三国志平话》中暴露无遗。三国历史虽然不长,但错综复杂,头绪纷繁,人物众多。陈寿《三国志》分别用《魏书》、《蜀书》、《吴书》来记载三国历史,这在史学上是一个创举。到了宋代“说三分”中,就不是像陈寿那样平分秋色,而是以说蜀汉为主了。《醉翁谈录》提到讲史内容时说:“三国志诸葛亮雄材,收西夏说狄青大略……”前引郑樵《通志·乐略》谈到说话时也说,“东方朔三山之求,诸葛亮九曲之势”,以上记载都说明“说三分”以诸葛亮为中心。周密《武林旧事》记载的讲史艺人中有“檀溪子”者,很可能是因为他擅长讲说刘备(蜀汉)故事而取这样一个艺名。《东坡志林》及其他宋人笔记中也说明,到了宋代,“尊刘贬曹”的倾向已经形成。在讲史基础上形成的《三国志平话》正是以蜀汉为主的,它是刘备和诸葛亮的合传,同时也写到了与两人关系密切的关、张、马、黄、赵等人的事迹,整个蜀汉阵营及兴亡过程给人以比较完整和深刻的印象。与之相反,曹魏和孙吴阵营则只能给人以模糊的印象,只是在写蜀汉时连带地写到。相对而言,对曹操的描写较多(因为他是刘备的主要对立面),但很粗疏。曹操的出场远没有刘、关、张和诸葛亮那样隆重,其事迹很不连贯,连他的死,在平话中也没有交代。该书中有插图七十幅,其中六十幅画的是蜀汉人物和故事。某种程度上说,这部《三国志平话》还不如称作“蜀汉平话”更合适。造成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讲史艺人的思想倾向(尊刘贬曹)影响了他们对故事素材的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说话艺术的客观限制。讲史艺人虽然舌辩滔滔,并时有穿插敷衍,但必须做到情节连贯完整,人物关系清晰,以便听众理解和记忆,既然选择了蜀汉为中心,就不得不割舍和这一中心没有直接联系的人和事。看来,人物传记式的叙事结构用来反映历史全貌是力不从心的,这种结构对叙事空间势必造成限制。

### 三、时空结构

在古代历史编纂方法中,虽有“六家”之分,但归根到底则是“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sup>②</sup>。编年体在扩展叙事空间上,具有纪传体无法企及的优势。现存最早的编年史著是《春秋》,但只是略具雏形。到了《左传》,编年叙事的技巧才得到提高和完善。刘知幾论《春秋》的记事特点时说:“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长也。”<sup>[1]</sup>但编年体也有其弱点,如果事件所经历的年代长,就会被割成一些片断分散到各自发生的年份中,从而损害了整体感。《左传》的成功之处在于必要时打破按年叙述的限制,通过适当剪裁,突出事件的主线,最主要的就是采用“追叙法”。如桓公十年记载郑、卫、齐三国对鲁作战,为说明其起因,追叙了四年前郑公子忽救齐有功,怨恨鲁人亏待他。最长的追叙大约是僖公二十三

<sup>①</sup> 俄罗斯学者李福清在分析《三国志平话》的“艺术时间”时,认为这部作品受到历史散文的影响很大,基本上采用了编年体的叙事结构,但并不是逐年纪事,而是跳跃式的时间描写。“其中的时间(即年代)段变得极大,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逻辑联系(编年史中写在一起的事件并无任何逻辑联系,仅因发生于同一年份)的、具有较大时间跨度的小故事。在《三国志平话》中,时间已经是一种缀合情节的因素,弥补了相邻事件之间并不总是明确的因果关系……作者对实际年代采取这样令人惊异的随意的态度,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之所以需要标明年代,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组织素材的因素,他只模仿编年史的形式,并不着力于准确复述它的按时间顺序的史事记载。”详见《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143页。李福清的观点与本文所论稍异,录此供读者参考。

<sup>②</sup> 参见刘知幾《史通》第一篇“六家”,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分别代表纪言、纪事、编年、国别史、通史、断代史六种体裁。第二篇“二体”,即论编年体和纪传体,认为“载笔之体,于斯备矣”。详见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年,在记述秦伯帮助晋公子重耳回到晋国之前,追叙了重耳出亡十九年的经过。重耳因晋骊姬之难,于鲁僖公五年由晋出奔狄,又经卫、齐、曹、宋、郑、楚,最后到达秦国。若将这些经历分散到十九年中叙述,就会前后悬隔,零乱而无系统,使人印象模糊。而通过集中追述,重耳的成长历程就十分清楚了。《左传》中这类追叙法深受后来史论家、文论家的推崇。自《史记》、《汉书》出,纪传体压倒编年体,在宋代以前已很少有史家采用编年体。到北宋中期,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使这一体裁重放异彩,并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导致了《通鉴外纪》、《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外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编年史著及《通鉴纪事本末》和《通鉴纲目》等新史体的问世,而且其影响还波及到民间讲史。《梦粱录》即载:“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从现存平话来看,《秦并六国平话》编年叙事的特征比较明显,它除了以《秦始皇本纪》为蓝本,还参考了《资治通鉴》,并从中直接搬用材料,如前文所引一段文字,就是来自《资治通鉴》。这部平话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写秦并六国的过程,主要是战争场面的描写,作为中心人物的秦始皇其实半隐半现,而以王翦等武将活跃在前台,略具编年体并列叙事的特点。但从总体上看,《秦并六国平话》的头绪并不复杂,基本围绕秦始皇展开叙述。讲史艺人“讲说《通鉴》”,主要是利用《资治通鉴》中丰富的史料,以及编年顺序的叙事方法。但为保持叙述线性,基本不取编年史的并列叙事(主要指互不相关而同时发生的事件),而且还避免使用“追叙法”,基本采用顺叙。

《五代史平话》的叙事结构最接近编年体。笔者曾撰文指出,保留宋代讲说“五代史”内容最多,最接近讲史原貌的应是《残唐五代史演义传》<sup>[2]</sup>。该传差不多也就是李存孝和王彦章的合传,其结构方式和《三国志平话》有相似之处。《五代史平话》则是改编者根据《资治通鉴》等史著修订讲史的产物,它不仅袭取《资治通鉴》的内容,也借鉴了《资治通鉴》的编年叙事结构,引人注目地运用了“追叙法”。编年体在追叙时例用“初”字起头,成为一种标志。《五代史平话》中以“初”字起头的追叙不下十余处,这是模仿《资治通鉴》而对说话传统的顺叙结构的突破。但《五代史平话》同时也吸取纪传体的叙事结构,最显著的一点是:平话不取《资治通鉴》的纪元,而将梁、唐、晋、汉、周五代分而叙之,以各自的帝王本纪编年。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并列叙事,使各代自成起讫,线索清楚。因为五代前后交错更替,时间接得很近。《资治通鉴》以各自开国的纪元编年,结果搞得眉目不清,《五代史平话》的编年取自新、旧《五代史》的本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对同一事件而涉及多人,平话则在“两三书中反复的叙了又叙”<sup>[3]378</sup>。旧《五代史》的体例是学《三国志》的。《三国志平话》以民间讲史为本,没有采取《三国志》分国别的体例;而《五代史平话》则模仿旧《五代史》以《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的体例分述,这也是改编者对讲史传统的突破。就各史平话的结构看,则主要还是以人物为中心,保存了讲史的固有特色。

通过以上对几种讲史平话的叙事结构分析可以看出,讲史平话对叙述线性十分重视,尽量保持情节线索的连贯和清晰;虽然借鉴了编年体的叙事方法,但并不致力于开拓叙事空间,摒弃了编年体的并列叙事,其叙事结构尚未达到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那样复杂的程度。

#### [参 考 文 献]

- [1] 刘知幾(撰),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2] 楼含松. 李存孝形象与五代史故事的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5)4:159-166.
- [3] 郑振铎. 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Pseudo-history: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Jiangshi Pinghua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LOU Han-s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jiangshi pinghua is a written literary genre that originated from the shuohua or storytelling, a form of folk art popular in the Song and the Yuan dynasties. It is an embryonic form of ancient popular novel. Because of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 themes and the conscious imitation of the creators, the jiangshi pinghua,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popular novel in terms of narrative features, is distinctly characteristic of pseudo-histo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it borrows narrative time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from traditional historical books. Through a double comparison with novel and historical texts, we find that the jiangshi pinghua employs the structure of the biographical and chronological forms of historical books, while following the clear theme and rich details of the shuohua.

**Key words:** the jiangshi pinghua; narrative speed; narrative sequence; the configu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 关于本刊加入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的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的渠道,《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已加入以下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访问地址为:<http://www.cnki.net>)、万方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访问地址为:<http://www.wanfangdata.com.cn>)、我国台湾地区中文电子期刊服务——思博网(CEPS,目前台湾地区最大的期刊全文数据库,访问地址为:<http://www.ceps.com.tw>)、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重庆维普,访问地址为:<http://www.cqvip.com>)。自此,读者可以通过其网址检索本刊于收录当年起各期的全文,还可以回溯检索历年所发论文的全文。

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其文稿刊登后可供以上数据库收录、转载并上网发行;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稿酬一次付清,本刊不再另付其他报酬。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请各位继续支持本刊,谢谢!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